

# 廖偉棠：

## 攝影、讀者、文化環境

李伽辰

廖偉棠這樣的年輕人令人十分敬佩。他是個知識淵博的文化人，密切關注社會問題，在2009年的城市文學節中，出席的十幾個作家之中他最年輕，也是和此活動針對的對象年齡差距最小的。但舉手投足間都見得超越年齡的沉穩與自信，他帶著一口南方口音，說話慢慢的，有條有理，言語之間常常閃出令人感動的字句，像是在讀他的詩一樣。正如他所講，語言是個人氣質的外露，採訪過程中，廖偉棠始終很隨和友好，詩人的神秘感成了最無需擔心的問題。

### 關於攝影

廖偉棠在大學進修的專業是電影攝像，而像電影這樣需要很多人合作完成的工作他覺得並不適合自己，他最初選擇攝影這種表現世界的方式僅出於攝影可以獨立操控的考慮。

他的攝影以紀實攝影為主。例如他主編的《Can影像誌》，呈現了不同環境下人的生活狀態，關於不同於主流教育體制的教育。不管是攝影還是其中的文字，看得出都是經過了深入的體驗，透徹的瞭解和理性的反思。對廖偉棠來說，影像比文字更直接對現實產生影響，但能夠產生影響的攝影作品應是像文字一樣能夠讓人反復咀嚼和反思的。“如今的攝影師大多存在人文素養不足的問題，數碼攝影的盛行更是滋長了這種趨勢。不加思考地



按很多次快門，總能挑出一張好的。”廖偉棠自己一直堅持用膠片攝影，為的就是保留膠片的神秘感。攝影中的偶然性因素令人興奮，他說那就如同寫詩過程中有靈感閃現。

詩歌與攝影兩種媒介的配合很是默契，一種是主觀情緒的流露，一種是客觀事實的呈現。紀實攝影需要的是切身體驗不同的生活，廖偉棠坦言他很享受這種四處奔波的生活。他相信藝術源自經驗，個人的生活體驗在自己所處的既定環境中非常有限，因此需要關注不同層次的人，不同的環境與事物，才能夠更真實地呈現給讀者。然而紀實攝影的內容往往不被主流社會所接納，特別是在中國內地的環境下，自然會受到嚴格的限制。對於這個問題，廖偉棠的態度還算樂觀，他說內地不能出版的雜誌可以在香港出版，通過網路宣傳，總會得到一些真正想要瞭解的讀者的關注。另一個途徑是舉辦放映會。比如在北京舉辦過的關於山西小煤窯紀實攝影的放映會，沒有大規模宣傳，獲得消息並來參加的一定是真正關注的人。這樣的觀眾所起的作用明顯大於隨意選擇的即使數量更多的參與者。“在這方面我是很入世的，”廖偉棠說，“攝影和文學都要為國家做點事情。所謂日拱一卒，不期速成，所有在中國想要做點事情的人都抱著這樣的想法，至少在大家的努力下縫穴在慢慢打開。”說到這裡，廖先生顯得有一點興奮，我亦被他的情緒所打動。

## 關於讀者

兼具攝影師和詩人雙重身份，詩人的地位要重得多。攝影的稿費可以用來謀生，而寫詩對於廖偉棠來說則是完全出於自身的熱愛。他從不考慮讀者能否讀懂他的詩，如何理解，或者是否

喜歡。當問到他的讀詩會中想要傳達給讀者什麼，他說這個問題他根本不會去考慮。“從一開始我就很清醒，我會用假想讀者來衡量自己的詩是否合格。”廖偉棠說，“我的假想讀者是杜甫、魯迅等我所喜歡的作家，他們給我及格就是及格，其他人都無所謂。”廖偉棠的創作風格則深受魯迅影響，特別是少年時代讀的《野草》，其中的虛無主義與晦澀的語言，使廖偉棠的詩語言尖銳伶俐，並偏好寫與主流價值相反的東西。他說詩歌是最不具功利性的藝術形式，即使不拿稿費都無所謂，他不希望文字作為謀生的手段。

他對自己很自律，每一首詩歌必定認真對待，從嚴要求。他認為詩人須有極強的綜合能力，能夠處理一切題材，應與小說看齊，而不像很多人所想的那樣輕快簡單。他認為藝術創作是個人氣質的自然外露，若有豐富的個性即可以提筆成文，而個性的培養則需要不斷汲取適合自己的養料。“我很相信古人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廖偉棠一臉認真，“我已經讀了幾千本書，還不到一萬本。我會繼續一直讀下去。”

廖偉棠的詩在香港和台灣深受讀者喜愛，特別是在台灣，他的大部分作品在台灣出版，獲過多項重要的文學獎項。自己的作品如此受歡迎，廖偉棠卻笑笑說這都是巧合。

## 關於文化環境

廖偉棠出生成長在內地，即使被多數作者稱為香港作家甚至誤認為台灣作家，他一直以來都十分關注內地的文化環境。“文化是在整個不自由的環境中最要求自由的。它受制於大環境的不自由。”他坦稱自己很反感內地的文學圈，因此拒絕加入作協，拒絕在一切內地的官方刊物上發表作品。他說即使自己的詩歌很受歡迎，也不可以此換取官方的肯定。

由於廖偉棠居住在香港，又在北京生活過五年的時間，他對兩地的文化環境自然非常瞭解，且能敏銳地覺察到變化。他說，

台灣相對來說情況好一些，香港和大陸的文化氛圍在日趨接近，大陸變得商業化，以前的藝術家朋友全部理性地想要賺取名利；香港的藝術家不再淡漠，開始急功近利為自己的作品找一些能夠引起人注意的意義，跟據新聞做作品。“現在的香港學生都很無聊，因為他們還在享受著建制帶來的好處，想革命都無法革命。他們的父輩是反叛的，這一輩一般來說會很保守。”問到廖偉棠是否更願意在香港定居，他毫不含糊地說自己隨時可能離開。人們把他定義為香港作家、內地作家還是台灣作家都無關緊要，“我給自己定義為漢語作家。”廖偉棠說，“畢竟一千年後不再有中國，不再有台灣，也不再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中華民國。這樣的定位其實是沒有意義的。”